

司馬談與《史記·天官書》 Sima Tan and *The Tianguan shu*¹

沙敦如 Dorothee Schaab-Hanke

德國弗萊堡大學 Germany, Freiburg University

Abstract

Sima Qian's father, Sima Tan, is assigned a strange role in the history of great Chinese intellectuals: Although he is given the honour of being mentioned in almost every study devoted to the Shiji as the initiator of the Shiji (Grand Scribe's record), the rest of the text is mostly concentrating on Sima Qian, taking him as the sole author of the text, apart from the "Liujia zhi yaozhi lun", and of the few statements in the last chapter of the Shiji, which Sima Qian testifies to have been voiced by his father.

This study is instead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Tan, rather than merely leaving behind a general vision and some ambitious plans, in fact wrote down some kind of text, a draft which Qian had at his disposal when he proceeded to finalize the work. The consequence of such an approach is that the Shiji must be searched for authorial layers. Such layers

1 本文作者感謝佛光大學歷史系系主任李紀祥教授的參會邀請，感謝主辦者為與會學者提供的既輕鬆又具有啟發性的討論氛圍，感謝葉翰教授 (Prof. Dr. Hans van Ess) 的評議，感謝易平教授的修改意見。吳秀杰博士協助校訂了本文的中文文本，在此一並致謝。

have been accepted by many for the time after (Tan and) Qian. There are convincing studies on the contributions of later hands such as Yang Yun and Chu Shaosun, but they have so far not been applied on what is generally considered as the "core text" of the Shiji.

The question of how it might be possible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an and Qian in a given text will be approached here on the basis of Shiji 27, the chapter on the "Office of the Heavens". This chapter is, as I think, of special interest here, since it was Tan, not Qian, who was the specialist for the Office of the Heavens.

In this paper, I will propose a tripartite structure for Shiji 27: a Tan layer, a Qian layer and one by a later hand. I will establish criteria of how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hese layers and discuss the conclusions which may be drawn from the text if it is perceived from this new angle.

一、前言

史學界提出司馬談（？—公元前110年），即司馬遷（約公元前145年—約公元前86年）之父親，應為《史記》作者之一的觀點，由來已久。在發表於1963、題為《司馬談作史》的著名論文中，顧頡剛（1893—1980）將自己的結論概括為：

（…）而《史記》之作，遷遂不得專美，凡言吾國之大史學家與大文學家者，必增一人曰司馬談。²

自顧文發表以來，「司馬談作史」之說漸漸為史學界廣為接受。其實，在此之前，已經有若干學者探討司馬談是否參與了、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參與了《史記》寫作的問題。在二十世紀上半期探討該問題的學者當中，顧頡剛之外，值得一提的還有王國維（1877—1927）³和李長之（1911—1978）⁴。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研究司馬談的學者主要有賴長揚⁵和張大可⁶。最近以來，對這一問題進行探討的學者主要有趙生群⁷、汪高鑫⁸、李福燕⁹以及易寧、易平¹⁰等。

司馬談是否作史，也是西方的《史記》學者一直關注的問題。法國的漢學家Édouard Chavannes（1865—1918）於1895—1905年間陸續出版了《史記》大部分篇目的法文譯本。在該譯本的前言中，Chavannes指出，這部著作實際上由兩個作者完成，即司馬談和司馬遷。他認為，為了能夠分辨哪部分作品出自哪位作者之手，對兩個作者的生平、思想進行深

2 顧頡剛：《司馬談作史》，史記研究粹編 [張高評主編]（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1992），88。

3 見王國維《觀堂集林》第十一章，「太史公行年考」，初版於1923年。該文的縮略本刊載於《司馬遷—其人及其書》一書中（台北：長安出版社，1985），198—214。

4 李長之：《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上海：開明書店，1948。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

5 賴長揚：「司馬談作史」補正，史學史研究1981.2，40+20。

6 張大可：《司馬談作史考論述評》，史記研究（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5），58—73。

7 趙生群：《司馬談作史考》，史記文獻學叢（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51—56。

8 汪高鑫：《司馬談與史記》，安徽史學2002.2，8—12。

9 李福燕：《簡論司馬談對司馬遷的影響》，南平師專學報23.1（2004），73—77。

10 易寧、易平：「司馬談作史」說質疑，《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81（2004.1），67—75。

入研究，是至關重要的環節。¹¹ 後來的幾位當代漢學家，如美國人 Burton Watson，以及 William H. Nienhauser 和他的研究隊伍，在他們的譯本介紹中，都提到了司馬談作為史家的角色，但是並沒有對此問題進行詳細的深究。¹² Stephen W. Durrant 在他的著作《迷霧之鏡》中就司馬談作史問題提出了一個大相徑庭的論點，他認為司馬遷也許故意給後來讀者留下其父親司馬談參與了《史記》寫作的印象，《史記》中所謂的出自司馬談之手的文本實際上可能是司馬遷之作。¹³ 在 Michael Loewe 於 2000 年出版的《秦、兩漢及新朝人名傳記辭典》中，司馬談的名字被列入詞條之中。作者不無遺憾地指出，目前尚無法確認在今本《史記》行文中的哪些部分出自司馬談之手。¹⁴ 就我個人所知，西方漢學界至今只召開過一次關於談、遷合作問題的專題研討會。該研討會由 E. Bruce Brooks 教授發起、組織，於 2005 年 10 月在美國馬薩諸塞州的 Amherst 舉行。但在討論確立一致性的標準，用於鑒別《史記》文本中的談、遷歸屬問題時，與會者未能達成共識。後來由於種種原因，該計劃目前處於擱淺狀態。¹⁵

目前，在本來就為數不多的從事司馬談研究的學者中，大多數人對明確區分司馬談、司馬遷作品的可能性持懷疑態度。¹⁶ 張大可的長篇研

-
- 11 Chavannes, Édouard : *L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 Ts'ien* (Paris : Angers, 1895-1905) , I , 7 .
 - 12 Burton Watson 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將《史記》的一部分翻譯成英語出版。參見 Watson , Burton : *Ssu-ma Ch'ien ,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 (New York : Columbia , 1958) 。 William H. Nienhauser 和他的研究隊伍正致力於出版《史記》的新英文譯本，他們的工作還在進行當中。參見 Nienhauser , William H. : *The Grand Scribe's Records , vol. 1 : The Basic Annals of Pre-Han China by Ssu-ma Ch'ien* (Bloomington & Indianapolis : Indiana University , 1994) , V .
 - 13 Durrant , Stephen W. : *The Cloudy Mirror. Tension and Conflict in the Writings of Sima Qian* (New York :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 1995) .
 - 14 Michael Loewe ,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the Qin , Former Han and Xin Periods (221 BC-AD 24)* (Leiden : Brill , 2000) , 487 .
 - 15 關於那次專題研討會的參加者和發表的文章，參見網站 www.umass.edu/wsp/conferences/wswg21/index.html .
 - 16 易寧、易平得出的結論是：我們認為「司馬談作史」之說「事出有因」。但是，從〈太史公自序〉裏記載司馬談本人和司馬遷的說法中，只能看到司馬談有論著歷史的理想，是否付諸行事，在〈自序〉和現在所能見到的漢代史籍文獻中均無記載。所以我們說「司馬談作史之事」查無實據，因文獻不足征，可以

究致力於在《史記》文本中找到司馬遷與司馬談創作的具體區別，但是在綜述自己的研究結論、回應顧頡剛提出的應該多關注司馬談一說時，他寫道：

我們同意這一結論，而對於司馬談的評介，也只能作這樣的概略論述，不可割裂《史記》篇目作具體分析。由司馬遷續父遺志發憤著述的《史記》是不容分割的一個整體。探索熔鑄在《史記》之中的一家之言，其代表只能有一人曰司馬遷。¹⁷

但是，這似乎還不是張大可的最後結論。在他2000年出版的著作《史記新注》¹⁸中，他就《天官書》中哪些部分出自司馬談之手，提出了一些具體的建議。本文的下一節將對張大可以及其他學者就《天官書》作者的各種觀點做詳細的介紹。

二、有關司馬談、司馬遷合作《天官書》的不同論點

在《史記志疑》一書中，梁玉繩（1744–1819）早已提到了司馬談與《天官書》的關係：

《史記·天官書》(…)太史公推古天變(…)稱太史公旨司馬談。¹⁹

趙生群在他1982年的研究中提到了梁玉繩的看法。他明确提出，《史記》中的「太史公」所指的有可能是司馬談，也可能是司馬遷。接著他又寫道：

存疑。若欲強為之說，則難免有違考信原則，而流於捕風系影之談矣。（同注釋9，第74頁）

17 張大可：《司馬談作史考論述評》，73。

18 張大可：《史記新注》（北京：華文出版社，2000）。

19 梁玉繩：《史記志疑》（北京：中華書局，1981）1.27。

顯然，這是司馬遷針對司馬談「太史公曰」的內容在發表不同的議論。由此我們可以推斷出，史記天官書「太史公推古天變」以前的文字，當為司馬談所寫定，（其後為司馬遷所續）。²⁰

我們從中可以看出，儘管趙生群的觀點基本上與梁玉繩的一致，即《史記·天官書》中留有司馬談的痕跡，但是，在斷定「太史公」所指為何人時，他與梁玉繩有所不同。趙生群認為，「太史公推古天變」中的「太史公」指的是司馬遷，而不是司馬談的自稱。

在上文提到的《司馬談作史考論述評》一文中，張大可試圖綜述諸家辨析司馬談、司馬遷作品的觀點。在涉及到《天官書》時，張大可只提到了趙生群的研究。但是，在總結性評論中，他認為趙生群未免走得太遠了。他寫道：

其後為司馬遷所續，這是沒有根據的。〈天官書〉八千餘字，「太史公曰」以下一千二百餘字是一長贊。若「太史公推古天變」以下才為司馬遷所續，那只是僅僅寫了半篇贊語，怎麼能說是續〈天官書〉呢？²¹

乍一看來，這段評論很像是對趙生群觀點的全面否定。但饒有興趣的是，在《史記新注》中《天官書》一章結尾處，張大可提出了一個非常詳細的建議，具體地指出了哪些文字為司馬談所著、哪些文字為司馬遷所著。與趙生群不同的是，在張大可劃定的結構中，談、遷文字的分界線還要提前一些，即以「太史公曰」為標志²²：在「太史公曰」之後的文

20 趙生群：《司馬談作史考》，53。

21 張大可，司馬談作史考論述評，72。

22 史記 27 (1342:13)。[全部《史記》引文出自中華書局版，括號內注明頁數和行數。]

字均出自司馬遷之手，²³而此之前的文字則出自司馬談之手。²⁴

三、辨析司馬談、司馬遷合作《天官書》的新設想

與梁玉繩、趙生群、張大可一樣，我也認為《史記天官書》中留有明顯的司馬談參與寫作的痕跡。但是，我認為趙生群所劃定的分界線比張大可的更有說服力。我也同意趙生群的觀點，即在「太史公推古天變」之後議論中的觀點與在「太史公曰」之後的有所不同。不過，在我看來，更為重要的是檢視這兩部分文字彼此之間的關聯，並通過這種方式來了解司馬談與司馬遷在觀點上與思想方式上的不同。

（一）、結構辨析

我建議將《天官書》²⁵全文分為三段：

[A] 段（假設作者為司馬談）：從開始至「然後天人之際續備」²⁶。A 段之下又分為四小節：[A1] 為恒星占²⁷。[A2] 為木火土金水日月占²⁸。[A3] 為妖星云气八風占²⁹。[A4] 為太史公贊詞。

[B] 段（假設作者為司馬遷）：自「太史公推古天變」至「則天官備矣」³⁰。[B] 段之下，又可以分為兩小節：[B1] 建立在司馬談的文字基礎之上，並對其進行討論。[B2] 始於「余觀史記，考行事」，是司馬遷本人所做的補充。

23 除了一段例外，下文還將提及（參見注釋31）。

24 張大可：《史記新注》，813。

25 參見陳久金，《史記·天官書》注譯，見：《帛書及古典天文史料注析與研究》（台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2001），168-257。

26 史記 27 (1344:8)。

27 史記 27 (1289:9-1311:1)。參見陳久金，185 以下，Chavannes，339 以下。

28 史記 27 (1321:1-1333:2)。參見陳久金，216 以下，Chavannes，389 以下。

29 史記 27 (1333:8-1342:6)。參見陳久金，239 以下，Chavannes，393 以下。

30 史記 27 (1344:10-1351:5)。

[C]段：自「蒼帝行德」始至「有奇令」結束³¹。可以肯定這段為後人所補充添加³²，因此本文對這一段內容忽略不計。

司馬談、司馬遷合作《天官書》情況一覽表

節段	史記27頁：行	
[A]	[1289:9-1344:8]	司馬談的原文
[A1]	[1289:9-1311:1]	談論恒星占
[A2]	[1321:1-1333:2]	談論木火土金水日月占
[A3]	[1333:8-1342:6]	談論妖星雲氣八風占
[A4]	[1342:13-1344:8]	談總論(即太史公曰)
[B]	[1344:10-1351:5]	司馬遷的續文
[B1]	[1344:10-1349:17]	遷傳述父親談話、緒論和發揮
[B2]	[1350:3-1351:5]	遷闡述自己的觀點和總結
[C]	[1351:5-10]	後人添加附會

從上述的結構辨析出發，下文將通過文本辨析，透過[B]段與[A]段的相對關係來更准确地分析[B]段的內容。

(二)、文本辨析

我之所以進行上述的結構劃分，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理由是，《天官書》行文中，「太史公」一詞出現在相距不遠的兩處文本中。首先是「太史公曰」，接下來是「太史公推古天變」。和趙生群的看法一致，我也認為「太史公推古天變」中的「太史公」與前文提到的「太史公」並非同一人，也就是說，第二個「太史公」是[B]段文本作者的自稱。

另外一個重要的理由在於這個句子的第二部分：

31 史記 27 (1351:5-10)。

32 梁玉繩已經提出「蒼帝」一段不屬於前文。參見 史記志疑 5, 791。瀧川龜太郎 於其《史記會注考證》(東京: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1932-1934;台北:天工書局, 1989重印), 1409, 也認為五帝一段屬於後人附加。王利器, 在其《史記注譯》(西安:三秦出版社, 1988), 959; 指出, 最後一段, 令人費解。亦見 張大可 在《史記新注》第812頁中寫到, 最後一段不屬於前文。

太史公推古天變，未有可考于今者。

此句之後，是完全理性的議論。儘管有無數專家不知疲倦的努力，但是自春秋以來的兩百四十二年間，他們搜集的材料沒有存留「至今」的。這句之後表明了[B]段作者（擔任太史公的角色！）對[A]段所敘述的占星內容提出略有保留的反思，似乎[B]段作者對[A]段作者提供的星占學資料還不完全滿意。

此外，[A]段作者還提到了一些早期占星者的名字，即：

在齊，甘公；楚，唐昧；趙，尹皋；魏，石申。³³

[B]段作者不僅重提[A]段中列舉的古代星象學者，而且加上了自己的反思，即：

近世十二諸侯七國相王，言從衡者繼踵，而皋、唐、甘、石因時務論其書傳，故其占驗凌雜米鹽。³⁴

[B]段作者尤其痛惜那些傳統星象學者如皋、唐、甘、石學說的不復存在：它們淪為諸侯國相爭的犧牲品，像米與鹽那樣隨風散盡。我們可以看到，在[A]段中，這些名字只是作為傳播星占學的人物被列舉出來。在[B]段，這些人名也被提及，作者對他們的貢獻有所反思。這種重復也正好可以為如下的論斷提供依據：[B]段與[A]段的作者並非同一人，但是[B]段作者接受了[A]段的敘述線索並將其延續。

同樣可以確認的是，[B]段作者明確地繼續[A]段作者歷數歷史上的占星人物，並將漢代以來的名字填補其上：

33 史記27 (1343:12-13)。

34 史記27 (1344:14-15)。

夫自漢之為天數者，星則唐都，氣則王朔，占歲則魏鮮。故甘、石曆五星法，唯獨熒惑有反逆行；逆行所守，及他星逆行，日月薄蝕，皆以為占。³⁵

在[A]段文本中，王朔，魏鮮也都被提及一次。³⁶但與[A]段文本不同的是，[B]段作者不限於繼續了[A]段作者列舉歷史上重要占星學人物的做法，而且將他們置於有體系的關聯之中。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列舉「自漢代為天數者」時，[B]段作者提到唐都這位著名的星象專家。眾所周知，唐都是司馬談的老師，後來也是司馬遷的同事，他們曾經一同為漢武帝編制新歷。在[A]段中，唐都卻沒有被提及。原因很可能是[A]段作者的謙虛。而[B]段作者將唐都寫進歷史，將其視為漢代偉大的星占學家之一，正是為了表達對[A]段作者的尊重。³⁷

在上面引述的這段文字中，值得注意的是，[B]段作者對嚴肅的星占家與非嚴肅的江湖術士有所區別。至少從「皆以為占」這個句子中可以感覺到此種傾向。非常有可能的是，[B]段作者有意識地將星占學中嚴肅的和非嚴肅的學派進行區分。

[B]段中的批判性反思精神，似乎也通過不同的用詞選擇體現出來。這至少可以從「察」和「考」在兩段文本中的不同用法略見一斑。「察」在[A]段中，共出現七次，總是與觀察占卜術聯在一起的。在[B]段中，「察」僅出現兩次，其用法與在[A]段中相似。³⁸「考」一詞只出現在[B]段，總共兩次，其中一次出現於「考于今」（用目前的情況來檢

35 史記 27 (1349:15-16)。

36 史記 27 (1340:9)，史記 27 (1338:7)。

37 在《史記後序》中司馬遷提到唐都是他父親司馬談的老師。參見史記 130 (3288:10)。

38 史記 27 (1344:13，1351:4)

驗)³⁹，另外一次出現於「考行事」(用歷史上的事件來檢驗)⁴⁰。[B]段使用的「考」比「察」更具有理性的、辨析的特點。在這樣的應用背景下，「察」似乎僅限於星占學之內的想法，而[B]段作者在兩次應用「考」一詞時，都把星占學說法放在另外的層次上來檢驗它的可信性：一種用於當今，另外一種用於事件歷史。

在兩個關鍵性的位置上，我們也可以看到「考」一詞的用法，即在《史記》列傳部分的開始，《伯夷列傳》⁴¹的開篇之處，以及在《史記》最後一章「後序」中涉及到《天官書》的文字中。在這裏，「嚴肅的」星占學與非嚴肅的「術」也有所區別。其原文如下：

星氣之書，多雜機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比集論其行事，驗于軌度以次，作天官書第五。⁴²

據我的推斷，《史記後序》的作者與在[B]段文字中使用「考」、「推」等詞匯的作者應為同一人。這位作者似乎非常熟悉那些屬於「經」類和非「經」類的文獻。通過進一步的文本研究，也許有可能確認，在總體語言應用上，[B]段作者比[A]段作者更熟悉古代經書及其早期注疏。

[A]段與[B]段的另一重要區別是，[B]段用很大的篇幅來論及天上觀測到的星象如何與地上發生的事件聯結在一起，而[A]段，如上文已經提到那樣，僅僅限於對星象的描述。在[B]段中，作者首先列舉天上的星域與地域的對應關係，繼之以自秦統一始至漢初止的歷史事件總覽。[B]段作者得出的結論是：歷史上，但凡重要事件發生之前，天上都會顯現出相應的征兆，即：

39 史記 27 (1344:10)。

40 史記 27 (1350:3)

41 史記 61 (2121:7)：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

42 史記 130 (3306:5-6)。

由是觀之，未有不先形見而應隨之者也。⁴³

我們可以看出，[B]段作者對他所評論和解釋的天象系統的有效性深信不疑。儘管[B]段和[A]段的差異有限，但二者之間的區別，也足以讓我們讀出來兩種不同的思想方式。

我認為，上述所有線索都指向一個方向：[B]段作者有意識地與[A]段作者進行思想上的交鋒。[B]段作者採取的方式是，部分地借助於增加解釋、推論、補充，部分地借助於充滿反思、批判性的評論。

四、試論談、遷鑒別問題

用上述的分析方法和區分標準得出來的分析結果，將如何用於分析司馬談與司馬遷的區別呢？首先，我們需要分別確定[A]段和[B]段的作者。由於司馬談不太可能在司馬遷的文字基礎上進行發揮，所以我們可以比較肯定地說，[A]段文字的作者為司馬談，[B]段文字的作者為司馬遷。

如果將[B]段文本與[A]段文本的關係推而廣之，應用到分析司馬遷與司馬談關係上的話，我們可以提出如下幾個見解：

- 1、司馬遷從擔任「太史公」的職務角色出發，繼續其父親司馬談所做的歷史紀錄。司馬談僅僅將為數不多的若干古代偉大星占家的名字存留於歷史當中，司馬遷則把這段歷史延續到漢武帝初年，並將其父親的老師唐都也寫進歷史。
- 2、司馬談描寫古代星占學及其他占術學派，均限於評論星占體系內的不同問題，而司馬遷在其父親提出的「分野」思想的基礎

43 史記 27 (134)。

上，通過分析古代歷史事件和當今事件與星象之間的對應關係，來檢驗「分野」思想的正確性。

- 3、司馬遷不僅僅限於繼續列舉漢代星占學專家，而且，他還對所謂嚴肅的與不夠嚴肅的占學代表進行評論。與其父親司馬談相比，他對星占學的態度更加理性、更加有所保留，體現出比較明確的學術意識。

由此三點可以看出，司馬遷對其父親司馬談歷史寫作框架的突破不僅體現在對歷史的描述上，更體現在他強調對歷史事件進行明辨與反思的態度上。這恰恰都與司馬遷在自傳中對自己與其父親區別的描述相吻合。他這樣寫道：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⁴⁴

即便把這段話理解為，司馬遷旨在與父親的對比中說明自己所處的位置，即他將父親的職業角色定位為「既掌天官，不治民」，通過這種閱讀方式，我們仍然可以有把握地說，《天官書》是理解司馬遷職責意識的關鍵性篇章：他關注的是國家治理者和歷史事件。換句話說，似乎司馬談與司馬遷兩人的合作才真正能擔當「究天人之際」的重大任務！或許，司馬談在他兒子年輕的時候，已經考慮到讓他將來擔當這份重任？

44 史記 130 (3293:11)。

五、結語

通過這樣的文本對比分析，我們可以明確地認識到，《史記》的兩個作者之間存在的觀點、思想上的差異。到目前為止，這一事實還未引起史學界足夠的注意。這對未來的《史記》研究將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呢？也許有人會以為，《史記》文本已經夠複雜了，因為裏面有很多可能屬於後人附會增加的內容。如果再將司馬談、司馬遷的區別增加進去，這無疑會使問題更加複雜化。儘管這一想法不無道理，但是，我仍然認為，關注司馬談、司馬遷的區別會帶來利大於弊的效果。也許很多現在困擾我們的問題，一比如在某一段落裏，我們听到的是一個人的聲音還是兩個人的聲音，為什麼在一些文本當中會出現「自相矛盾」之處，就會迎刃而解。我確信，如果我們將有關的文本段落與作者重新對應的話，很多這樣的「自相矛盾」就會自行消失。⁴⁵

我們寄希望於，在今本《史記·天官書》中的發現，即密切相關的兩個作者以令人贊嘆的方式合作完成今本《史記》之行文，也同樣適用於其他章節。如果我們以這種分析方法，可以達到明確辨析司馬談與司馬遷各自對《史記》文本貢獻的目標，這並不會有損於這部偉大作品「成一家之言」的價值。正好相反，正如中國古代注疏學所表明的那樣，一個學派的根基並非取決於歷代不變的、一致性的看法，其生命力恰恰在於根據不同時代和需求對某一基本思想進行闡釋和說明。從這個意義上說，如果我們承認，在《史記》的原初文本中，與我們進行對話的是兩個人，而不僅是一個人，這不但不會限制、反而更會加深我們對《史記》的理解。

45 這些所謂的「自相矛盾」常常讓史學界討論一些諸如「作者」更傾向與儒家還是道家、五行學說或者五百年天道輪回學說對作者有怎樣的影響等問題。